



## 我和敦煌學

饒宗頤

編按：國學泰斗饒宗頤教授，對敦煌學術藝術，無論是研究還是創作，都有重大貢獻。配合「敦煌韻致——饒宗頤教授之敦煌學術藝術展」隆重舉行，本刊今期特刊登饒教授鴻文《我和敦煌學》，讓讀者能進一步瞭解饒教授在敦煌學上的心路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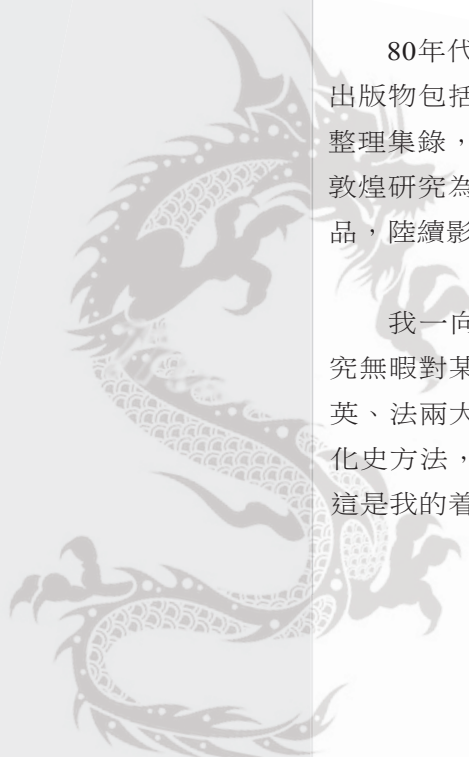
敦煌學在我國發軔甚早。我於1987年寫過一篇《寫經別錄》，指出葉昌熾在《緣督廬日記》中，他已十分關注石窟經卷發現與散出的事情，有許多重要的報導。近時榮新江兄發表《葉昌熾——敦煌學的先行者》一文，刊於倫敦IDP News 1997年，七期，說得更加清楚。

80年代以後至今，國內敦煌研究，浸成顯學，專家們迎頭趕上，雲蒸霞蔚，出版物包括流落海內外各地收藏品的影刊——英京、俄、法以至黑水等處經卷的整理集錄，令人應接不暇，形成一股充滿朝氣的學術生力軍。以往陳寅恪老慨歎敦煌研究為學術傷心史，現在確已取得主動地位，爭回許多面子。此後，海外藏品，陸續影印出來，學者們不必遠涉萬里重洋，人人可以參加研究了。

我一向認為敦煌石窟所出的經卷文物，不過是歷史上的補充資料，我的研究無暇對某一件資料做詳細的描寫比勘，因為已有許多目錄擺在我們的面前，如英、法兩大圖書目錄所收藏均有詳細記錄，無須重複工作。我喜歡運用貫通的文化史方法，利用它們作為輔助的史料，指出它在歷史某一問題上關鍵性的意義，這是我的着眼點與人不同的地方。



國學泰斗饒宗頤教授





張世林先生兩度來函，要我寫《我與敦煌學》一文，萬不敢當，久久不敢下筆。我本人過去所做的敦煌研究，榮新江兄已有文評述，見於復旦大學出版的《選堂文史論苑》（頁265—277），我的重要著述和對學界的影響，詳見該文，不必多贅。現在只談一些值得記述的瑣事，追憶我如何對敦煌資料接觸的緣遇。

我最先和敦煌學結緣是因為從事《道德經》校勘的工作。1952年我開始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那時候《正統道藏》還是極罕見的善本，我還記得友人賀光中兄為馬來亞大學圖書館從東京購得小柳氣司太批讀過的《正統道藏》，價值殊昂，當時香港及海外只有兩部道藏，無異秘笈。我因代唐君毅講授中國哲學的老、莊課程，前後三載，我又研究索紉寫卷（有建衡年號），做過很詳細的校勘工作。我和葉恭綽先生很接近，他極力提倡敦煌研究，他自言見過經卷過千件，對於索紉卷他認為絕無可疑（可參看他的《矩園餘墨》）。以後我能夠更進一步從事《老子想爾注》的仔細探討，實導源於此。正在這時候，日本榎一雄在倫敦拍製Stein搜集品的縮微膠卷，鄭德坤先生方在劍橋教書，我得到友人方繼仁先生的幫助，託他從英倫購得了一部，在50年代，我成為海外私人唯一擁有這部縮微膠卷的人物。我曾將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中的倫敦讀敦煌卷的初步記錄核對一遍，這樣使我的敦煌學知識有一點基礎。我講授《文心雕龍》亦採用英倫的唐人草書寫本，提供學生參考。1962年，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年刊》印行的《文心雕龍研究專號》最末附印這冊唐寫本，即該縮微影本的原貌。當時我已懷疑馮氏拍攝的由第一頁至第二頁中間，攝影有缺漏。1964年我受聘法京，再至倫敦勘對原物，果有遺漏。這一本專號所複印，實際上是唐本的第一個（有缺漏的）影印本，如果要談《文心雕龍》的版本，似乎應該提及它，方才公道。

所謂「變文」，本來是講經文的附屬品，源頭出於前代陸機《文賦》「說煒曄而譎誑」的「說」，與佛家講誦結合後，隨着佛教在華的發展，逐漸形成一嶄新的「文體」的變種。但從「變」這一觀念加以追尋，文學有變種，藝術亦有變種，兩者同時並肩發展，和漢字的形符與聲符正互相配合。文字上的形符演衍為文學上的形文，文字上的聲符演衍為文學上的聲文。劉勰指出的形文、聲文、情文三者，形與聲二文都應該從文字講起。所謂變文，事實上應有形變之文與聲變之文二者。可是講變文的人，至今仍停留在「形」變這一方面。古樂府中仍保存「變」的名稱，聲變則凡唱導之事皆屬之。試以表示之如下：

變文	{	形文→變相	圖像之屬
		聲文→字音節奏	韻律唱腔之屬



我寫過一篇從《經唄唱導師集》第一種《帝釋天樂般遮琴歌唄》加以說明的文章。姜伯勤兄因之撰《變文的南方源頭與敦煌唱導法匠》，唱導是佛經唱誦音腔的事，我所說變文的聲變之文應該是這一類。大家熱烈討論形變之文的變相，只講「變文」的一面，對於聲變之文這另一面則向來頗為冷落，甚至有誤解。王小盾博士對這一點有深刻的認識，可惜不少人至今尚不能辨析清楚。南齊竟陵王蕭子良在雞籠山邸與僧人講論的是「轉讀」問題，即謀求唱腔的改進，與聲調完全不相干。到了唐代教坊有大量的「音聲人」，音聲人還可以賞賜給大臣。《西陽雜俎》記玄宗賜給安祿山的物名單，其中即有音聲人一項，兩《唐書·音樂志》音聲人數有數萬人之多。敦煌的樂營有樂營使張懷惠（P·4640）與畫行、畫院中的知畫都料董保德（S·3929）相配合，一主聲變的事務，一主形變（變相）的事務，兩者相輔而行。變文之音聲部分，還須再作深入的研究。敦煌樂舞方面，亦是我興趣的重點，我於1956年初次到法京，看了P·3808號原卷宗，寫有專文補正林謙三從照片漏列的首見樂曲的《品弄》譜字，由於我在日本大原研究過聲明，又結識林謙三和水源渭江父子，對舞譜略有研究。我於1987年初提出研究舞譜與樂譜宜結合起來看問題，我講敦煌琵琶譜，仔細觀察法京原件及筆跡，事實是由三次不同時期不同人所書寫的樂譜殘紙，黏連在一起，把它作為長卷，長興四年才寫上講經文，可以肯定琵琶譜書寫在前，無法把它作為一整體來處理。葉棟當它全部視為一套大曲是錯誤的。我這一說已得到音樂界的承認。我主張樂、舞、唱三者應該聯結為一體之說，引起席臻貫的注意，他力疾鑽研樂舞，把它活現起來，因有樂舞團的組織，我忝任顧問，他二度到香港邀我參觀，深獲切磋之樂。1994年9月6日我到北京，在旅館讀*China Daily*的文化版得悉他病危的噩耗，十分痛惜。1995年7月，敦煌樂舞團隨石窟展覽蒞港表演，我追憶他寫了一首律詩云：「賀老纏絃世所夸。紫檀掄撥出琵琶。新翻舊譜《胡相問》，絕塞鳴沙不見家。<sup>[1]</sup>孤雁憂思生羯鼓，中年哀樂集羌笳。潛研終以身殉古，歎自吾生信有涯。」表示我對他的哀悼。

敦煌各種藝術尤其是壁畫，我是最喜歡的，由於長期旅居海外，無條件來作長期考察，無法深入研究，只得就流落海外的遺物作不夠全面的局部捫索。我所從事的有畫稿和書法二項。我們深感唐代繪畫真跡的缺乏，所謂吳道子、王維都是後代的臨本。1964年我在法京科學中心工作，我向戴密微先生提出兩項研究工作，其一是敦煌畫稿，後來終於寫成《敦煌白畫》一書，由遠東學院出版。我年輕時學習過人物畫像的臨摹，有一點經驗，我特別側重唐代技法的探索，粉本上刺孔的畫本，法京有實物可供研究，亦為指出，我方才明瞭到，布粉於刺孔之上留下痕跡斷續的線條便於勾勒，這樣叫做粉本。近日看見胡素馨（S.F. Fraser）的《敦煌的粉本和壁畫之間的關係》一文（《唐研究》三期），文中在我研究的基

[1] 莊嚴所藏敦煌《浣溪沙》佚詞，起句云：「萬里迢亭不見家，一條黃路絕鳴沙。」



礎上歸納出粉本草稿有五種類型，計壁畫、絹幡畫、藻井、曼陀羅四類，絹幡畫則可分臨與摹二類。實則臨與摹二者，臨是依樣而不遵照準確輪廓，摹則依樣十足。這些畫樣，畫人運用起來可以部分摹、部分臨，亦不必限於幡畫。



書法的研究，我在接觸過Stein全部微卷之後，即加以重視，立即寫一篇〈敦煌寫卷的書法〉附上《敦煌書譜》，刊於香港大學1961年的《東方文化》第五卷。後來居法京排日到國家圖書館東方部借閱敦煌文書。先把法京收藏最早的北魏皇興五年書寫的《金光明經》和永徽年拓本的唐太宗書《溫泉銘》作仔細的研究。以後遍及若干重點的經卷寫本，作過不少專題研究，除作解題之外還注意到字體的花樣，1980年秋後在日本京都講學，承二玄社邀請為主編《敦煌書法叢刊》，分類影印，從1983年起，月出一冊，共二十九冊，前後歷時三載。每一種文書都作過詳細說或考證。由於翻成日文，在國內流通不廣，周紹良先生屢對作者說：「各文書的說明，極深研幾，應該合輯成一專書，獨立出版。」至今尚無暇為之。本書又有廣東人民出版社刊印本，題曰《法藏敦煌書苑菁華》，共八冊。

我於1963年出版《詞籍考》一書，戴密微先生了解我對詞學薄有研究，約我合作寫《敦煌曲》，由於任老舊著《敦煌曲校錄》錄文多所改訂，與原卷不相符，須重行勘校，我又親至英倫檢讀原件，時有弋獲，如《謁金門》開于闐的校



錄、五台山曲子的綴合等等。任老後出的《總編》和我有一些不同看法，特別對《雲謠集》與唐昭宗諸作，我有若干專文進行討論，已收入另著《敦煌曲續論》中（1995，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昭明文選》的敦煌本，亦是我研究的專題，我首次發表敦煌本《文選》的總目，和對《西京賦》的詳細校記，我現在匯合吐魯蕃寫本，另附精麗圖版與詳盡敘錄勒成專書，將由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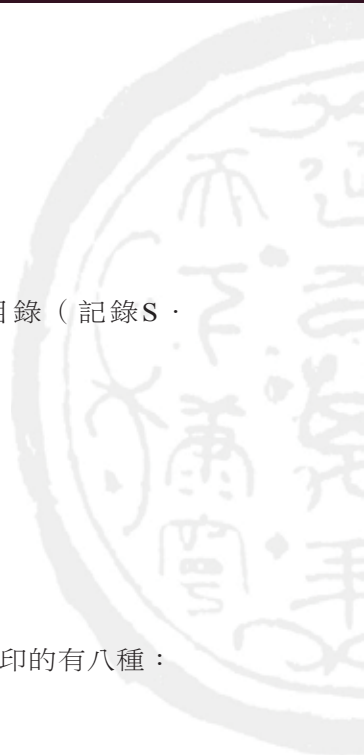
《文選》序有「圖像則贊興」一句話，我作了詳考，在《敦煌白畫》書裏面，我有一章討論邈真贊的原委。法京友人陳祚龍君從敦煌寫本邈真贊最多的P·3556（9人）、3718（17人）、4660（39人）三卷及其他錄出，輯成《唐五代敦煌名人邈真贊》一專書，開闢一新課題，繼此有作，得唐耕耦、鄭炳林二家。1991、1992年間余復約項楚、姜伯勤、榮新江三君合作重新輯校，編成《敦煌邈真贊校錄并研究》，方為集成之作。

所謂敦煌學，從狹義來說，本來是專指莫高窟的塑像、壁畫與文書的研究，如果從廣義來說，應該指敦煌地區的歷史與文物的探究。漢代敦煌地區以河西四郡為中心，近年出土秦漢時期的簡冊為數十分豐富，尚有祁家灣的西晉十六國巨量陶瓶。又吐魯蕃出土文書中有敦煌郡所領的冥安縣佛經題記。所以廣義的敦煌研究應該推前，不單限於莫高窟的材料。

1987年得到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協助，與中文大學合作舉辦敦煌學國際討論會。1992年8月，該中心幫助我在香港開展敦煌學研究計畫，在中文大學的新亞書院成立「敦煌吐魯蕃研究中心」，延攬國內學人蒞港從事專題研究，由我主持出版研究叢刊，主編專門雜誌。先時於《九州學刊》創辦《敦煌學專號》，出過四、五期。後來與北京中國敦煌吐魯蕃學會、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合作，辦一雜誌即《敦煌吐魯蕃研究》，由季羨林、饒宗頤、周一良主編，每期30萬字，至今已出版第一卷（96年）、第二卷（97年），第三卷正在排印中，此外香港敦煌吐魯蕃中心復出版專題研究叢刊，由我主其事，先後出版者有八種。我提倡輯刊《補資治通鑑史料長編》，用編年方法，把新出土零散史料加以編年，使它如散錢之就串，經過數年工夫，已稍有可觀。

茲將香港敦煌吐魯蕃中心已出版《敦煌吐魯蕃中心研究叢刊》開列如下：

- （1） 饒宗頤主編《敦煌琵琶譜》。
- （2） 饒宗頤主編《敦煌琵琶譜論文集》。
- （3） 饒宗頤主編，項楚、姜伯勤、榮新江合著《敦煌邈真贊校錄並研究》。



- (4) 榮新江編著《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錄（記錄S·6981—13624號）》。
- (5) 張湧泉著《敦煌俗字研究》。
- (6) 黃征《敦煌語文叢說》。（此書獲得董建華基金獎）
- (7) 趙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
- (8) 楊銘《吐蕃統治敦煌研究》。
- (9) 饒宗頤主編《敦煌學文叢》。

《補資治通鑑史料長編稿系列》，由饒宗頤主編，已出版及排印的有八種：

- (1) 王輝《秦出土文獻編年》。
- (2) 饒宗頤、李均明著《敦煌漢簡編年考證》。
- (3) 饒宗頤、李均明著《新莽簡輯證》。
- (4) 王素著《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
- (5) 王素、李方著《魏晉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
- (6) 劉昭瑞《漢魏石刻編年》。
- (7) 陳國燦《吐魯番出土唐代文獻編年》。
- (8) 李均明《居延漢簡編年》。

其他在撰寫中的有下列各種：

胡平生《樓蘭文書編年》。

姜伯勤《唐代敦煌宗教文獻編年》。

榮新江、余欣《晚唐五代宋敦煌史事編年》。

莫高窟儲藏的經卷圖像早已散在四方，據粗略統計有數萬點之多，目前正在清查，作初步比較可靠的全盤統計。這些秘笈為吾國文化史增加不少的研究新課題，同進開拓了不少新領域，為全世界學人所注目。近日歐洲方面，特別在英京已有《國際敦煌學項目通訊》（*Newslet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縮寫為 IDP）的刊物。我和日本藤枝晃教授被推為資深Editor人物之一，殊感慚愧。目前我所從事的研究工作，還有甲骨學、簡帛學部分，忙不過來，只好掛名附驥，聊盡推動之責。我於上文列出的各種工作，我要衷心感謝得到國內多位年輕為學者的支持，還希望有力者對我們鼎力充分的飲助，使我能夠繼續完成這一心願。以渺小之身，逐無涯之智，工作是永遠做不完的，我這一點涓滴的勞績，微不足道，匆促寫出，備感惶悚，就到此為止，算是交卷了吧。

（原載《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八（上）頁291至299，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本文由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提供及授權轉載，特此鳴謝。）